

# 《资本论》哲学化解读再研究

常庆欣 张 旭

**摘要:**《资本论》哲学化研究认为,《资本论》考察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时代,研究了“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了“人与人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资本论》实现了某种哲学革命。这种研究,把物与物和人与人之间的复杂的表现、掩盖与支配的多维关系,简化为一种缺乏解释力的单纯的掩盖关系,把以物(商品)的关系为“中介”的人的相互依赖的历史阶段,呈现为用抽象概念就足以描述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时代。对《资本论》所做的哲学化解读只有使马克思退回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水平上才能够成立,它不会为我们理解《资本论》中的核心思想提供应有的帮助。

**关键词:**《资本论》 《资本论》哲学化解读 人与人的关系 物与物的关系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 一、引言

几乎没有哪位思想家不承认马克思的伟大贡献。这种情形,在我们这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家自不必说。在西方知识界,哪怕是马克思的批判者,也承认“马克思主义一直存在于西方知识分子的意识当中。……它对现实的有力批判和对未来的热切期望从未离场”<sup>①</sup>;考虑到马克思的生活环境,“马克思,作为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家和政治社会学家,他的成就是非凡的、史诗般的。”<sup>②</sup>

但是,我们却遇到了一种困境,即在现实中,这种能激发起无尽的想象和坚定的信仰的观念体系——马克思主义,出现了被边缘化的情形。很多研究分析过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在本文中,我们关注的是一个隐蔽的、时常被忽略的造成马克思主义边缘化的原因:那些抱着善良的意愿,以“能答复一切和说明一切”<sup>③</sup>的豪迈之气,频频宣称马克思在这里实现了这般的理论创新,在那里进行了那样的思想革命的研究,是造成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的原因之一。在本文的研究中,我们以那些声称《资本论》实现了某种哲学革命的研究为批判考察的对象,去解释为什么一些缺乏客观的基础、严密的论证、自称为理论创新的研究会伤害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普及。

① Ian Shapiro. *The Moral Foundations of Politics*.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74.

② John Rawls.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319.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80页。

[收稿日期] 2019-11-11

[作者简介] 常庆欣,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北京 100871

张旭,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及相关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北京 100732

在对《资本论》哲学化这种研究现象进行考察时，我们力争避开在理论批判活动中容易使人跌落其中的各类陷阱。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评价某些黑格尔的批判者时说，他们“只局限于……抓住黑格尔体系的某一方面，用它来反对整个体系，也反对别人所抓住的那些方面”<sup>①</sup>；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序言中说，不能“用自己的见解去反驳他的见解。因此消极的批判成了积极的批判；论战转变成对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sup>②</sup>。上述引文中提到的情形，即“用体系的某一方面”反对“整个体系”，或“用自己抓住的方面反对别人所抓住的那些方面”，以及“用自己的见解去反驳别人的见解”，都是在理论批判活动中应该要竭力避免的。也就是说，在下面的研究中，在我们自己和其他人（对《资本论》做哲学化解读的研究者）都把《资本论》作为研究对象的意义上，我们不会因为发现了某个力图证明《资本论》是哲学著作的论证中存在的某个错误或缺陷，就急于去否定别人研究的整体论证；我们不会用《资本论》中的经济学内容来反对别人发现的《资本论》中的哲学内容，或某些内容中潜在的哲学意义；我们更不会把《资本论》中具体内容的经济学解读用以反对别人对同一内容进行哲学的解读。我们不是在和某个学科争夺《资本论》的阐释权，或者说去阻碍对《资本论》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做多方面的解读和创新。我们的目标在于，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论》“连贯的阐述”的内容呈现出来，并把它和《资本论》哲学化的论证做出对照，由此证明，说《资本论》实现了一种哲学革命的观点不仅完全站不住脚，而且还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造成很大的理论伤害。

在文章的第一部分，我们对《资本论》哲学化的不同表述方式进行简单梳理，以使我们考察的对象变得清晰。文章的核心是第二、第三部分的研究，这两部分对在论证《资本论》实现哲学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两个观点进行驳斥。文章在结语部分以前面两部分的分析为基础，说明《资本论》哲学化论证的出现是一种特殊研究方法的产物，并简单探讨摆脱这种研究取向的基本态度。

## 二、《资本论》哲学化的表现形式

在理论研究中，宣称《资本论》实现了哲学革命的论证，存在不同的表现形式。

第一种表现形式，也是最简单的表现形式，是从研究方法出发，认为承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可能会造成不良的理论后果。比如，强调“把《资本论》的哲学思想限定为如何‘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其直接后果，不只是影响到对《资本论》哲学思想的阐释，而且深刻地影响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因此，“不是《资本论》‘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资本论》‘建构’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指出，“学界普遍认为《资本论》推进、发展和深化了历史唯物主义”，但是，又强调“在推进和发展的具体方式问题上——《资本论》（及其相关手稿）究竟是‘运用’还是‘建构’了历史唯物主义”，“并未达成一致”。最后论证说，《资本论》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建构。我们必须把《资本论》看作历史唯物主义本身”<sup>③</sup>。

第二种表现形式是从对《资本论》的内容的特殊解读开始，或者说是从哲学和经济学的关系的视角出发，认定《资本论》中的研究形成的是某种哲学成果。比如，认为“揭露‘政治经济学’的‘病根’，才会产生马克思的《资本论》；认清‘政治经济学’的‘病根’，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页。

③ 刘建卓《“运用”还是“建构”——〈资本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17年第1期。

《资本论》。正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构建了以《资本论》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sup>①</sup>。这一类论证强调，《资本论》中尽管有大量的经济学研究内容，但它们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这种“批判”基础上形成的理论成果，不是政治经济学，而是哲学。但对于这种经由“政治经济学批判”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是什么，却未曾予以详细展开。

第三种表现形式直接宣称《资本论》实现了某种哲学革命，比如，宣称《资本论》是“存在论”、“本体论”、“新世界观”等。

宣称《资本论》是一种存在论的观点认为，因为马克思“把‘存在’视为‘现实的历史’的存在，因而以探索‘解放何以可能’而‘改变世界’。正是以‘改变世界’的理论自觉，马克思终生致力于研究‘现实的历史’；而对‘现实的历史’的研究，则形成了马克思为之付出毕生心血的《资本论》。《资本论》是关于‘现实的历史’的存在论”<sup>②</sup>。《资本论》揭示了“‘物与物的关系’所表征的被异化的‘人与人的关系’”，这直接“构成《资本论》的‘存在论’内涵”<sup>③</sup>。

宣称《资本论》是新世界观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集中地体现在《资本论》中。比如，认为《资本论》是“充分展现马克思新世界观的一部哲学著作”，“西方现代哲学的基本特征都可以在《资本论》中找到”<sup>④</sup>。这种论述完全无视恩格斯在《反杜林传》中明确说的“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而这一阐述包括了相当多的领域。我们的这一世界观，首先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共产主义宣言》中问世，经过足足20年的潜伏阶段，到《资本论》出版以后，就越来越迅速地、为日益广泛的各界人士所接受。”<sup>⑤</sup>也许，这里真正重要的问题只是去思考，为什么《资本论》出版后，早已问世的一种世界观会迅速地被日益广泛的各界人士接受，而不是去解释《资本论》创立了什么新世界观。

宣称《资本论》是一种独特的本体论的观点论证说，由于“‘人的解放’是马克思的哲学旗帜；‘解放’的‘根据’则是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问题。这表明，马克思的本体论既是从思维方式上与传统本体论的断裂，又在从‘人的解放何以可能’的求索中开辟了本体论的现代道路”<sup>⑥</sup>。“‘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不是把实践当成作为‘世界本原’的‘本体’，恰恰相反，是从‘实践观点’作为‘思维方式’的反本体论的哲学革命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sup>⑦</sup>，因此，《资本论》是“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意义上的本体论。这种认识要求读者完全不必，最好也不要再去纠缠“实践”在马克思那里所具有的丰富的含义；更不要去追问在不把实践当成“本原”之后，实践除了可以是思维方式外，还有没有可能是行动。在马克思那里，既有最初的作为“理论批判”的“哲学的实践”，也有“阶级斗争实践”，以及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的思维和存在之间“相互联系的中介”的“生产实践”，等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仅把实践引入认识论，更重要的是发现了实践在社会历史中的基础地位”<sup>⑧</sup>。

在上述将《资本论》哲学化的不同形式的论证中，有两个发挥了重要的证明功能的论点。我们以问题的形式来转述这两个论点就是《资本论》中涉及的“物与物的关系”掩盖的“人与人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含义？“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马克思论述的人的发展的三种形式中第二种形式的核心特征吗？

① 孙正聿 《〈资本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1期。

② 孙正聿 《“现实的历史”：〈资本论〉的存在论》，《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③ 温权 《资本批判的三重向度与〈资本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构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6年第5期。

④ 侯依成 《〈资本论〉开启了现代西方哲学》，《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页。

⑥ 孙正聿 《解放何以可能——马克思的本体论革命》，《学术月刊》2002年第9期。

⑦ 孙正聿 《怎样理解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3期。

⑧ 黄楠森等主编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1卷，北京出版社，1996年，第454、455、458、459页。

### 三、物与物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表达、掩盖与支配

在一种典型的《资本论》哲学化论证中，我们发现了把“物与物的关系”掩盖的“人与人的关系”作为一个重要论点的论证。比如，说“揭示物和物的关系中所掩盖的人和人的关系，这深切地体现了马克思睿智的哲学思想”<sup>①</sup>；认为“只有通过具体的‘经济范畴’的分析去理解全部的历史，才能真实地展现物和物的关系掩盖下的人和人的关系，从而破解‘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秘密”<sup>②</sup>。

我们认为，说马克思揭示了“物和物的关系掩盖下的人和人的关系”，在研究的意义上，等于什么也没有说。毕竟马克思认为“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成为多余的了。”此外，这种揭示工作古典经济学家已经做了，而且做得还很不错！马克思说古典经济学把“物的人格化和生产关系的物化，把日常生活中的这个宗教揭穿了”，并说这是“古典经济学的伟大功绩”。我们很想知道，马克思揭示物的关系对人的关系的掩盖时体现出的“睿智的哲学思想”到底是什么？在马克思看来，古典经济学家已经把“生产关系的物化”给揭穿了，古典经济学的问题在于“还或多或少地被束缚在他们曾批判地予以揭穿的假象世界里，因而，都或多或少地陷入不彻底性、半途而废状态和没有解决的矛盾之中”<sup>③</sup>。在将马克思同庸俗经济学进行比较时，说马克思揭示了“物和物的关系掩盖下的人和人的关系”也许还算是客观。因为庸俗经济学“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sup>④</sup>，只是“对实际的生产当事人的日常观念进行教学式的、或多或少教义式的翻译，把这些观念安排在某种有条理的秩序中”<sup>⑤</sup>。

将马克思、古典经济学家和庸俗经济学放在一起进行整体的比较，我们不难明白，说马克思要研究的是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下的人和人的关系，从而《资本论》是存在论，最多只是把马克思拉回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水平上，或者说不过是把马克思的思想的独特价值淹没在了某些认识论常识中。这种判断完全无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讨论物与物以及人与人的关系时提出的真正重要的三个问题或三层含义。它们分别是：（1）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为什么人与人的关系必然会以物与物的关系（商品关系）的形式来表现？（2）在具体的含义上，所谓的“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下的人和人的关系”，到底指的是什么掩盖了什么？（3）《资本论》中讨论的物与物的关系支配了人与人的关系，这里所说的“支配”又有什么历史的、现实的含义？

第一，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层级式掩盖关系，它首先是一种人与人的关系必然以物与物的关系表现自身的反映关系。

前文已经提到，马克思评价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说他们“不彻底”、“半途而废”。这种评价是什么意思呢？马克思说“诚然，政治经济学曾经分析了价值和价值量（虽然不充分），揭示了这些形式所掩盖的内容。但它甚至从来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一内容采取这种形式呢？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呢？”<sup>⑥</sup>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问题的关键不是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了人与人的关系，这种掩盖当然要以人与人的关系必然以物与物的关系为必然的中介，或者说必然以物与物的形式表现自身为前提。忽视这个前提，说什么马克思发现了“物与物的关系掩盖的人与人的关系”，完全不是对《资本论》研究成果的科学再现，而是对其所

① 孙正聿 《“现实的历史”：〈资本论〉的存在论》，《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② 孙正聿 《〈资本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1期。

③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5、940页，第94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9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97-98页。

蕴含的思想的歪曲。

发现价值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不是马克思的原创贡献。讲明为什么这种价值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而且必然以商品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才是马克思区别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真正的科学成就。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在评价一位意大利经济学家时会说“当加利阿尼说价值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关系时，他还应当补充一句：这是被物的外壳掩盖着的关系。”<sup>①</sup>也就是说，“在商品生产占支配地位的地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然采取物与物的关系的形式”<sup>②</sup>，从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表现的形式，不能简化为藏在下面的真正本质和虚幻的现象之间的对立。相反，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既被表现又被遮蔽的过程”<sup>③</sup>。由此看来，反复讲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人与人的关系，而对人与人的关系必然通过物与物来表现不置一词，是对这个“既被表现又被遮蔽的过程”的无知，也是无法真正弄明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历史、内在的矛盾及其历史趋势的。在此基础上，把马克思自己说的研究目标，即“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sup>④</sup>扔一边，说什么哲学革命、存在论、新世界观，就一点都不会令人感到惊讶了。

在这里真正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神秘性质不是从它的某种偶然的特征中，或是从资本家愚弄工人的技巧中产生的，而是从它最核心的东西中，从商品的本质中，也就是从劳动产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必须采取的形式中产生的”<sup>⑤</sup>。也正是因为如此，鲁宾会说“在关于内容和形式的问题上，马克思采用了黑格尔的观点而不是康德的观点。康德认为形式是内容的外部联系，就像是内容外部加上去一样。从黑格尔的哲学观点看，内容通过自身的发展产生了形式，而这种形式早就潜在包含于内容当中。形式必须由内容本身产生。”<sup>⑥</sup>

第二，具体而言，把交换关系对生产关系的掩盖说成“物与物的关系掩盖的人与人的关系”是错误的。概括地看，“物与物的关系掩盖的人与人的关系”包含两层基本含义：交换关系对生产关系的掩盖，以及和这种掩盖紧密相关的物的自然属性对人的关系的社会、历史属性的遮蔽。

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当我们看到一个交易时，我们只是看到了一个两幕剧的第二幕，第一幕是生产这些商品。商品生产既是一个个体行为，也是一个社会过程。市场提供了一种社会成员相互作用的机制。在“交换的不断重复使交换成为有规则的社会过程”的社会形态中，“私人劳动在事实上证实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只是由于交换使劳动产品之间、从而使生产者之间发生了关系。因此，在生产者面前，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就表现为现在这个样子，就是说，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sup>⑦</sup>。尽管如此，不断重复的交换只是使“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表现为“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必要前提条件。生产决定交换的基本性质却没有随之改变，“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sup>⑧</sup>。

在《资本论》中，生产关系的内容是复杂的，以至于“这一用语甚至不为某些社会主义的理论家所领悟”<sup>⑨</sup>。尽管如此，在生产关系包含的最基本含义上，人们还是达成了共识。生产关系可以根

①④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8、91页，第8页，第107、90页。

② Norman Geras, *Essence and Appearance: Aspects of Fetishism in Marx's Capital*, *New Left Review*, No. 65, January-February 1971, p. 76.

③⑤ Alex Callinicos, *Althusser's Marxism*, Pluto Press Limited, 1976, p. 48, p. 49.

⑥ Rubin, I., *Essays on Marx's Theory of Value*, Black Rose Books, 1990, p. 117.

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页。

⑨ 亨利希·库诺《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马克思的社会学的基本要点》，袁志英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498页。

据它们的作用加以界定，它们“决定社会生产力的使用权；……决定生产过程的产出，即社会财富的分配形式”，因此，“生产关系所发挥的这些作用意味着它可以有两种形式。它们可以是一个人（一群人）和另一个人（一群人）之间的关系。资本家雇主和他的雇员之间的关系是第一种类型的生产关系；雇主对原材料或工厂的所有权是第二种类型的关系。”<sup>①</sup>

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关系包括财产关系。在《资本论》中，讨论物与物和人与人的关系时，至少有了三种基本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物与物的关系。前两种关系表现在雇佣关系或财产关系中，后一种关系表现在纯粹的生产的技术关系上。当我们理解了这些基本关系后就会明白，说“商品与商品之间的交换关系”掩盖了“作为人与物之间的一种生产关系（财产关系）”，是广义的、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了人与人的关系的一层重要含义。也正因为如此，阿尔都塞所说的“生产的社会关系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还原为简单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能还原为仅仅涉及人的关系，因而不能还原为一个普遍模式，即主体间的相互关系的各种转化形式（承认、威望、斗争、统治和奴役等等）”<sup>②</sup>，是正确的。

另外，一旦商品交换关系在人类发展的特定社会形态中占据了支配地位，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就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社會性、历史性及其可变性、暂时性，开始被物的自然属性掩盖。这正是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学者视资本主义制度为自然的、永恒的制度的关键原因。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回答“商品形式就具有的谜一般的性质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时说，“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sup>③</sup>也就是说，商品形式的奥秘在于“劳动的社会性质”被“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掩盖。在《资本论》第2卷、第3卷中，马克思在不同的地方分别讨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性，讨论的焦点始终是物的自然属性对人的社会关系的独特属性的掩盖。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的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的直接融合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sup>④</sup>这里真正的含义是生产关系的社會性、历史性，从而它们的暂时性和可变性，被从表面看的商品交换关系，或者说物（商品）与物的关系具有的自然属性掩盖。所以，马克思说“在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甚至商品生产的最简单的范畴时，在论述商品和货币时，我们已经指出了一种神秘的性质，它把在生产中由财富的各种物质要素充当承担者的社会关系，变成这些物本身的属性（商品），并且更直截了当地把生产关系本身变成物（货币）。”<sup>⑤</sup>

第三，物的关系支配了人的关系，只是支配的丰富含义中的一重含义。物与物的关系掩盖的人与人的关系的叙述框架，无法全面理解《资本论》中讨论的“支配”或“统治”的多重含义。

在将《资本论》哲学化的研究成果里，时常可以读到类似下面这些说法，比如在评论马克思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sup>⑥</sup>时，说这个伟大理想“要求把人从物的统治下解放出来”<sup>⑦</sup>。这里说的“物的统治”，在本质含义上还只是停留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① S. H. 里格比 《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学》，吴英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25页。

② 路易·阿尔都塞，巴里巴尔 《读〈资本论〉》，李其庆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20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938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40、936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页。

⑦ 孙正聿 《〈资本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1期。

有关异化的某种理解上。对这种异化情形，洛克曼给出了精炼的概括——“异化的结果包括损害——生命活动被消耗在产品生产中；失去——产品不属于工人而术语生产资料所有者；以及费尔巴哈的倒置——生产产品的人依赖于产品，比如为了谋生。”<sup>①</sup>在《资本论》中，的确有不少地方讨论的是这种类型的支配。我们认为，把这种支配概括性地称为物对人的支配是合理的。但是，物与物的关系掩盖的人与人的关系这种研究及叙述框架，无法理解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支配或统治的具体含义。

在《资本论》中，还有一种通过剩余价值理论才能得以清晰地理解的另一种支配，即处于雇佣劳动关系中的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严格地说，这是一种人对人的支配，这种支配以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为前提，而这种支配之所以能够实现，又得益于另一个前提，即商品生产和交换体制的普遍存在。“商品生产和交换体制的普遍存在”，把我们引向了《资本论》中讨论的第三种支配，即一种社会结构的支配。

对于这种结构，依据详细程度的不同，马克思在不同的著作里都做出过说明。比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说“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互相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无关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sup>②</sup>；在《资本论》第1卷中讨论商品拜物教时，马克思说“实际上，劳动产品的价值性质，只是通过劳动产品表现为价值量才确定下来。价值量不以交换者的意志、设想和活动为转移而不断地变动着。在交换者看来，他们本身的社会运动具有物的运动形式。不是他们控制这一运动，而是他们受这一运动控制”<sup>③</sup>；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说“在叙述生产关系的物化和生产关系对生产当事人的独立化时，我们没有谈到，这些联系由于世界市场，世界市场行情，市场价格的变动、信用的期限，工商业的周期，繁荣和危机的交替，会以怎样的方式对生产当事人表现为压倒的、不可抗拒地统治他们的自然规律，并且在他们面前作为盲目的必然性发生作用。我们没有谈到这些问题，是因为竞争的实际运动在我们的计划范围之外，我们只需要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组织，在它的可说是理想的平均形式中叙述出来。”<sup>④</sup>

在上述论述中，无论是“普遍交换”、“社会运动”，还是市场“竞争”，指的都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交换体系。这也是为什么斯威齐认为“商品世界一经——比方说——取得了它的独立性，并把生产者置于它的支配之下，那么，后者终将把它看成是事物的本性，很像看待自己所必须学着适应的另一个外在世界一样”<sup>⑤</sup>的原因。第三层次的支配，不是人对人的支配或物对人的支配，它既包含以物与物的关系为中介的人对人的支配，也包含异化含义上的物对人的支配。但是，倒过来说人对人的支配和物对人的支配构成了第三种支配的全部内容，则是错误的。此外，这种生产和交换结构的支配，是由人自己的生产活动造就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研究焦点，就是通过商品和资本范畴去把握这种结构支配形式。也正是因为这种结构支配的存在，解放全人类才会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理想，因为“人类——资本家和工人两者都包括在内——受到了这种物化的世界的影响”<sup>⑥</sup>。

总之，《资本论》中至少研究了三种支配形式：第一种是作为异化的环节的物对人的支配，比如工作就是为了谋生；第二种是通过剩余价值榨取进行的资本家对工人的控制和支配；第三种是作为一种社会结构的商品生产社会对所有人的支配或统治。先入为主地粗暴应用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人与人的关系框架，是无法理解马克思使用的“支配”或“统治”的不同层次及这些层次之间的内在联系的。

① 汤姆·洛克曼《卡尔·马克思的哲学》，杨学功等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第10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0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41页。

⑤ 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陈观烈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4页。

⑥ G. 希尔贝克，N. 伊耶《西方哲学史：从古希腊到二十世纪》，童世俊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434页。

#### 四、人的依赖关系的“中介”变化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在将《资本论》哲学化的相关研究中，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人的存在方式的理解，非常的与众不同。这种独特的理解，在论证《资本论》实现了某种哲学革命时，发挥了重要的论证作用。

在一个典型研究中，作者论证说“就‘现实的历史’而言，人已经从总体上实现了从‘人的依赖关系’转化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sup>①</sup>此外，人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存在，是一种异化状态，“人们的普遍联系在普遍交换中被异化为物与物的关系，由此便构成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人的存在方式”<sup>②</sup>。揭示并走出这种“异化”状态，是马克思的“本体论承诺”和“理论聚焦点”。最后，人们一旦从这种异化状态中摆脱出来，就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人从‘物’的普遍统治中解放出来”、“从‘资本’的普遍统治中解放出来”、“‘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变为人的独立性和个性”<sup>③</sup>。因为“人类的当代使命，绝不仅仅是使人的‘独立性’奠基于对‘物的依赖性’，而且必须使人从对‘物的依赖性’中解放出来，把‘物’的独立性真正地变成人的独立性即人自身的全面发展”<sup>④</sup>。

上述论证参考的核心材料，是马克思的一个被反复引用的著名段落“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第二大形式，既是人的发展形态，也是社会关系的新表现形式）。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sup>⑤</sup>

把《资本论》哲学化研究中对三种形式的解读和马克思自己的表述相对照，我们不难理解，从字面上看，《资本论》哲学化语境中对人的发展的三种形式做出的新表述，主要改变的是马克思所说的第二、第三个阶段的含义。在新表述中，“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个阶段；“‘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变为人的独立性和个性，或“‘物’的独立性真正地变成人的独立性即人自身的全面发展”是第三个阶段。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面对这种新表述时，我们不禁要问：它们是否准确地表达了马克思要传递的思想？假设新表述准确地表达了马克思的思想，那么，对马克思的表述进行的这种转换，是否以某种方式深化了人们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我们下面的分析会对这两个重要问题进行回答。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马克思在有关人的发展的三种形式的表述中所要传递的核心思想呢？毫无疑问，从关于三种形式的注明段落中，可以概括出很多能够把观念安排在其中的“有条理的秩序”。比如，从“能力”出发，我们可以建立一种观念秩序：狭小范围和孤立地点上发展着的人的生产能力，全面的能力体系，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再比如，把三种形式理解为：人的依赖性社会、物的依赖性社会、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sup>⑥</sup>；还有本文要深入讨论的理解，把三种形式解释为：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把“物”的独立性真正地变成人的独立性即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很明显，一种有条理的秩序和另外的有条理的秩序之间存有某些重要的差异。比如，上文后两种理解之间，明显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对第二个阶段的理解上——这一阶段的典型特征是“依赖”还是“独立”呢？

①③ 孙正聿 《〈资本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1期。

②④ 孙正聿 《“现实的历史”：〈资本论〉的存在论》，《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页。中央编译局把原译文中的“形态”改为“形式”，本文采用修改后的翻译。

⑥ 赵家祥 《资本逻辑与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3期。



很显然，没有谁会觉得仅仅局限于这段引文就能彻底明白马克思的思想的本质。这种从人的依赖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再到人的全面发展，看似阶段清晰、连续一致的论述，是对马克思的含意的准确表述吗？我们认为，不是。做出这个判断，并非因为这种表述的含义不及马克思自己的表述想传递的思想完整或丰富。毕竟，在哲学的意义上，所有的研究都不可能在终极意义上是全面的，都可能有其隐含的或明确的前提或预设。新转述的重大缺陷在于：它不仅没有为我们理解马克思要传递的核心思想提供应有的帮助，而且这种转述只有在让马克思退回到他力图超越的新兴资产阶级思想家所达到的思考水平上才是成立的。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展开论证：第一个方面和讨论人的发展形式时的划分标准相关；第二个方面与“物的依赖关系”和“人的依赖关系”的联系和区别相关。等到我们既明白了理解人的发展形式的理论基础，也把握了物的依赖关系和人的依赖关系的完整含义，也就能评价上述理论判断是否适当了。

马克思做出人的发展的三种形式的划分时使用的区分标准，以及做这种区分的背景和语境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有两点特别值得强调：（1）马克思对人的发展状况的描述，是在社会经济形态演化的背景下展开的；（2）马克思是在《货币章》中系统地论述了人的发展的三种形式的理论的。

在具体的层面上，马克思是在“一切产品和活动转化为交换价值”、“交换延及一切生产关系”成为经济的核心特征的时代论述人的发展的三种形式的。这意味着：（1）“交换延及一切生产关系”这种情况是历史的形成的。这就是马克思为什么批判说，在斯密那里“先于历史的东西，倒是历史的产物”。（2）马克思认为，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交换的基础是人性——自利，以及私利即公益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私人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3）马克思还指出，在这一时期，“不管活动采取怎样的个人表现形式”，“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个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相互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独立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4）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背景，即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他对人进行讨论时，通常把对人与人的关系的分析置于研究的核心，我们简称为“关系视角中的人”。上述分析表明，在理解人的发展形式时，必须遵循马克思的思想，即从历史的、社会的、物质的、关系的视角，去理解人的发展形式。与这种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理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从抽象概念的视角去理解人的关系，比如自由、平等、独立、博爱等。因此，把第二阶段的核心解释为“独立性”，事实上是一种理论上的倒退。总之，尽管我们可以引入不同的有序结构和认识框架，去分析马克思的那段著名引文，但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是用马克思自己的思想方法作为理解它们的基础。

有了上述正确的思想方法基础，我们就能更准确地理解“物的依赖关系”和“人的依赖关系”的本质，以及那个著名段落的真正含义。

马克思说，假如我们考察的是不发达的交换制度下的社会关系，“个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较明显的人的关系”，表现为“作为具有某种规定性的个人而互相发生关系，如作为封建主和臣仆、地主和农奴等等”，也就是说，表现为人的依赖关系。在发达的交换制度中，“在前一场合表现为人的限制即个人受他人限制的那种规定性，在后一个场合则在发达的形态上表现为物的限制即个人受不以他为转移并独立存在的关系的限制”。在不发达的交换制度和发达的交换制度的对比中，前一种制度中人与人的关系是人的依赖关系，即“个人受他人限制”；在发达的交换制度中，物的依赖关系或物的限制，指的是“个人受不以他为转移并独立存在的关系的限制”。很明显，所谓的物的依赖或物的限制，指的是“独立于个人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会说“物的依赖关系无非是与外表上独立的个人相对立的独立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与这些个人本身相对立而独立化的、他们互相间的生产关系”，“物的依赖关系，不用说，又会转变为一定的，只不过除掉了一切错觉的人的依赖关系”<sup>①</sup>。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51、57-59页。

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当他说“个人受不以他为转移并独立存在的关系的限制”时,这里的“关系”的准确含义是“以物的关系表达的生产关系”。对物的依赖,简单地讲,至少有两种含义:(1)类似于人类对食品这种物的依赖,在任何时代都会存在;(2)商品生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形态对人的支配的意义上的人对物的依赖,这种情形只在资本主义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存在。前一种含义,必然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前提。但在分析资本主义的历史属性时,这种依赖显然不会是分析的基础。分析资本主义的历史属性的关键点只能是第二种意义上的物的依赖。

马克思的“物的依赖”包括以下重要含义:(1)物的联系、物的社会关系、物的依赖,指的是同样的对象;(2)它们的具体内容是人的社会联系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形式;(3)人与人的关系采取商品交换的中介形式,是社会的、历史的产物,是过程中的东西,相对人对人的直接依赖关系而言,它是一种进步;(4)物的关系或物的依赖关系,“这些外部关系并未排除‘依赖关系’,它们只是使这些关系变成普遍的形式;不如说它们为人的依赖关系造成普遍的基础”。

如果对上述理解存有疑虑,我们可以从马克思在论述人的发展的三种形式时对与“依赖”形成对照关系的“独立”或“自由”的解释,从相反的方向上,进一步理解物的依赖是什么含义。

马克思认为,在发达交换制度下,“各个人看起来似乎独立地”,个人“自由看起来比较大”。但这种独立或自由,首先“一般只不过是错觉,可叫作——在彼此关系冷漠的意义上——彼此漠不关心”,这种“自由”不过是“自由地互相接触并在这种自由中互相交换”;其次,所谓的“独立”、“自由”,“只有在那些不考虑个人互相接触的条件即生存条件的人类看来,各个人才显得是这样的”,这里的“互相接触的条件”即物的关系,或者说物的依赖。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不难明白马克思在分析人的发展的三种形式时致力于揭示的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典型本质及其丰富内涵在于:(1)在商品生产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形态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采取了以物与物的关系(即商品交换关系)为中介的形式。(2)物的关系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商品生产占据支配地位之前的人的依赖关系的中介形式,并同时造就了一种人对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社会结构的依赖。(3)在辩证的意义上,上述物的依赖对人的依赖的取代,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这种进步体现在人摆脱了人身依附,但是这种取代同时造成了无产者更深程度的依附。(4)自由或独立只是表面上的,只是在拥有以“物的形式”存在的“社会权力”或“社会抵押品”的前提下,这种独立和自由才能转化为现实。进一步讲,即使拥有了这种“社会权力”,所有人也仍受一种生产结构的支配。因为甚至作为剥削阶级存在的资产阶级,也是处于一种异化状态。这里的支配有三种类型:传统意义上的人身依附、商品世界对所有人的支配以及工人因一无所有而不得不通过表面上自由平等的交换关系忍受拥有生产资料的阶级即资本家阶级的剥削。对工人和无产阶级而言,自由和独立只是表面上,从本质上看,他们在承受着双重的支配或压迫:商品世界对他们的支配,以及因为一无所有而不得不承受的资本家对他们的剥削。这其实也恰恰是为什么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时代的“普遍阶级”,认为解放全人类的任务只能由无产阶级承担的原因。(5)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形式,呈现出间接性和疏远性,使资本主义时代的支配和剥削变得更加隐蔽、更加难以揭露,同时又为资产阶级为自己进行辩护获得了更大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所以,马克思说,对于“物的依赖关系的永恒性的信念,统治阶级自然会千方百计地来加强、扶植和灌输”。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让“物的依赖形式”自身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性和社会性,消失在物的自然属性中,从而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有了坚实的基础:表现在生产参与者面前的物与物的关系的中介形式,是人们理解自己所处其中的社会特征的最直接的形式。

在人的发展的第三种形式中,不是资本的独立性转化为人的独立性,这种转化在技术的意义上是不可能的,在社会的含义上则是一种退化。第三种形式的核心在于,“独立性”只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一个方面。全面发展的真正含义在于,“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

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是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sup>①</sup>，即“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组织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sup>②</sup>，“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sup>③</sup>。物的依赖，或者说作为人与人的关系的“中介”的物与物的关系，就是这个“神秘的纱幕”。

对《资本论》所做哲学化论述中的人的发展的三种形式分析，貌似提供了一个进步的序列，但实质上远离了马克思的核心思想。综合马克思的研究方法、马克思做出人的发展的三种形式的论述的时代背景和上下文语境，我们不难理解，在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发展的三种形式中，人与人的关系始终是核心。在第一阶段是人身依附关系。在第二阶段是以物的关系为中介或表现形式的人与人的关系，其实质仍然是人的依赖关系，只不过是以隐蔽的方式存在而已。在第三阶段，人们创造自己的关系，把上一阶段创造的能力置于自由联合的人的共同控制之下。换一个角度理解也是如此。比如单纯从物的视角看：最初的人与人的关系以贡献的方式表现，接下来以商品交换表现，第三个阶段以共享劳动产品的形式表现。

此外，说第二阶段是“物的依赖的人的独立性”的分析，还存在下面这些明显的缺陷：

第一，把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中介的物的关系，混淆为人获得独立性的手段。一旦进入这种混淆状态，人的发展的三种形式就成了从依赖到不完全独立，再到完全独立的三个阶段。但事实上，在马克思的分析中，焦点并不是“独立”，也不是什么从依赖到独立，而是依赖的表现形式的变化，或者说是人与人之间社会交往关系的表现形式的变化。只有这种对表现形式的历史发展形式的变化及其典型特征的分析，才能真正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历史性、社会性、暂时性及发展的历史趋势，才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否则，只会跌入建立抽象观念的有序游戏中去。

第二，把商品关系和价值关系错误地应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和后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论》哲学化论证中，论者指出，形成交换价值的抽象劳动是构成不同社会形式的基础。这种理解完全是错误的。这不仅是因为马克思一再强调“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而且也因为我们无从为下面这个问题找到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答案。这个问题是：构成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社会形式的基础的抽象劳动分别又是什么？把价值关系应用到其他时代，是因为不明白马克思所说的依赖关系在人类发展历史上的不同的表现形式：从自然血缘类的依赖，到以商品为中介的依赖，到以个性充分发展为基础的彼此依赖。

第三，不明白物化、客观化、外在化与异化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在现实中和马克思的思想中的体现和发展。在《资本论》哲学化研究中，论者说人们的普遍联系在普遍交换中被异化为物与物的关系。这里的“异化”是什么意思呢？在马克思的思想进展中，这里主要指的是客观化、外化或物化，而非异化的含义。其实，不是人们的普遍联系被异化为物与物的关系，而是人与人的关系在人类历史的一定阶段必然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是“物与物的关系”成为人与人的依赖关系的中介。这种物质前提，仅仅是异化的必要条件，而非异化状态自身。如果这类典型的《资本论》哲学化的论证能够从《资本论》中的材料出发，就不会忽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章中对“欧洲昏暗的中世纪”，到“家庭”和“自由人联合体”，再到对“商品生产者的社会”进行的比较分析<sup>④</sup>。就能明白从人的发展的三种形式，到《资本论》中异化概念是如何具体体现、不断深化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52、55、59、5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8页。

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7页，第90、94-97页。

## 五、结 语

《资本论》以商品作为出发点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社会性、物质性，并说明新社会形态的萌芽是如何在资本主义这种暂时性的社会形态中萌发的，以及在何种前提条件下，这些萌芽会真正成长成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形态。《资本论》的研究，是抽象分析和经验研究完美结合的典范，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运用和充实，是辩证方法的具体化和实例化。

而将《资本论》作为存在论、本体论、新世界观进行的研究，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实现的具体的和现实的研究拉回到一种高度概括的、语言游戏式的、缺乏逻辑力量，而且极为倚重有序的观念结构所要求的生硬排列的研究状态中。这类研究成果在动摇对《资本论》理论性质的科学理解的同时，丝毫没有为人们理解《资本论》或当代资本主义及其超越，增添任何新的见解和动力。

这种将《资本论》哲学化的研究，是一种我们称之为“挤压快照式研究”的哲学活动的产物。诺奇克对这类活动有形象的说明：“有一种哲学活动看起来就像挤压一些东西，以使其符合某种固定的具体形状。所有东西都摆在那里，它们必须被压进去。你将材料挤压进这个固定的区域，它在一边压进去了，在另一边又鼓了出来。你来回转动，把一个鼓起之处按平了，另外一处又鼓起来了。这样，你就不断地挤压，削平这些东西的棱角，以使它们符合要求；你不断按压，直到最终几乎所有东西都暂时各安其位；而对于不符合要求的东西则抛得远远的，以使它们不再被注意。（当然，并非所有这些做法都是粗鲁的，也有甜言蜜语、花言巧语以及语言技巧）很快，你找到了一个看起来非常合适的角度，并拍了一张快照，其快门速度刚好在某些东西鼓出来从而被注意到之前。然后，回到暗室，按照其形状构造来修饰各种破绽。余下的事情就是发表这张照片，把它作为事物究竟如何的表象，并指明这张照片中的任何东西都不可能具有其他的形状。”<sup>①</sup>

既然在论证《资本论》是存在论时，论者使用了学术界频繁出现的“范式”一词，那我们就借机重温一下库恩的话：“科学知识像语言一样，本质上是一个团体的共同财产，舍此什么也不是。为了理解它，我们必须认清那些创造和使用它的团体的特征。”<sup>②</sup>《资本论》哲学化研究用一些高度抽象、涵盖度极高的术语，用因为两个手表时间相同（而且时间相同还是作者自己刻意摆弄指针的结果）就宣称一个手表是另一个手表的原因或在本质上等同于另一个手表这般的论证方式，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里的这个地方、那个地方，在看得见的地方、看不见的地方，在葛兰西“同公开表达的东西相互矛盾的形式”<sup>③</sup>里，找到了各种“创新”、各种“革命”、各种“突破”，而完全不去理会“创造和使用”这些“共同财产”的“团体的特征”。这里的特征既包括这种财产的创立者坚持的哲学思想，也包括今天的继承者经过艰难的研究过程达成的共识。对于《资本论》研究而言，这种哲学思想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这种共识就是，《资本论》是一本伟大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资本论》哲学化的研究，在行为上，基本上就是卡普在一个故事中讲到的，一个醉鬼在深夜丢失了他房间的钥匙，并坚持要在最近的一盏路灯下寻找，因为他觉得只有在那里光才最亮<sup>④</sup>。尽管某些研究可以把很多美好的形容词和良好的期望都赋予马克思和他的著作，但却因自己的局限而远离马克思自己想要真正传递的信息。这类研究，不会给马克思带去多少荣誉，但却一定能给他送去“过多的侮辱”<sup>⑤</sup>。

（责任编辑：王云川）

① 罗伯特·诺奇克《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姚大志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5-6页。

②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88页。

③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姜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17页。

④ Abraham Kaplan. *The Conduct of Inquiry: Methodology for Behavioral Science*,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9, p. 11.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6页。